



著作者说

## 历史演进中的切尔诺贝利



广东人民出版社  
[美]沙希利·浦洛基 著  
《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

《大国的崩溃》作者、东欧史顶尖学者沙希利·浦洛基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当切尔诺贝利爆炸发生时，他的住所就在受损的核反应堆下游不足500公里的地方。在《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一书中，浦洛基利用新近公开的政府档案，结合大量幸存者的访谈素材，详尽叙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背景、起因、过程、后续，及其对人类与自然、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作为该事件的同时代亲历者，他希望用事实的记录，唤起未来人们如何安全利用核能的思考。

□浦洛基

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从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发生爆炸，到2000年12月核电站关闭，再到2018年5月对受损核反应堆最新覆盖的完成，《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首次详述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来龙去脉。在我开始对切尔诺贝利展开研究之际，与上述历史有关的保密档案资料得到解禁，我的工作因此受益颇多。2014年乌克兰一系列的政治变动也引发了档案革命，使得之前保密的克格勃资料前所未有地向世人公开。更多其他政府档案也向公众开放了，如此一来，想要查询那个时代的资料，包括核事故后的各类文件就变得容易了。

我以一位历史学家和事件同时代人的双重身份创作此书。核爆炸发生时，我的住所就在受损的核反应堆下游不足500公里之地。我的家庭和我本人并未受到直接影响。但是，数年后当我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时，医生说我的甲状腺有些红肿，这是暴露在辐射中产生的让人担忧的症状。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很好。我大学时的一位同学，曾在事故发生后的数日内，以警察的身份被派往切尔诺贝利，他每年都要在医院住上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另一位大学同事也曾于爆炸发生后，在核电站附近待过一阵子，看上去身体却很好，他现在在美国教授苏联史。和他们以及其他事件参与者进行交流，重拾我自己关于此次核灾难的记忆，这一系列行为使我能够更好地再现那些为了尽可能减少核反应堆堆芯熔化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宁愿牺牲健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的思想与初衷。

我们沿着核灾难的时间线索越向前推进，事件就变得越扑朔迷离，越难理解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根源和实际结果。我在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使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我还利用了最新获得的档案资料和最近发布的政府文件，采访了诸如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尤里·谢尔巴克等事件亲历者和相关主题的作家，因而能从较长的时间维度来描述此次核灾难，及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从受损的四号核反应堆控制室到禁区内废弃的村庄，再到基辅、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治人物，全书观点纷杂，逐一道来。将切尔诺贝利事件放在国际历史学的背景下考量，我们有可能得出具有全球意

义的结论。

作为一段历史，切尔诺贝利事件确实是一次技术灾难，它不仅重创了苏联核工业，还影响了苏联的整个体制。这次事故拉开了苏联终结的序幕：在此之后的五年多时间里，这个世界超级大国便四分五裂，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是苏联自身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良运转所造成的。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不仅挑战，而且颠覆了苏联旧有的秩序。公开性政策使媒体和公民有权纵论时政、褒贬当局，而这一政策正是源于后切尔诺贝利时代。随着民众越来越多地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原有的保密文化逐渐退却。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使政府承认，生态问题可以成为苏联公民成立自己组织的合法理由，这一做法打破了苏共对苏联政治活动的垄断。首批苏联群众团体和政党在生态运动中出现，并且席卷了苏联污染严重的工业中心。

辐射涉及每个人，从政党领导人到普通民众，切尔诺贝利事故使各个民族和各行各业的人对莫斯科及其推行的政策愈加不满。乌克兰作为废弃核反应堆的故乡，此次事件对其造成的政治影响，比起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深刻。乌克兰政坛两大针锋相对的对手——主政的共产主义政党和新生的反对派，在反对莫斯科，尤其是反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方面找到了共识。1991年12月，当乌克兰人投票赞成国家独立时，他们已将庞大的苏联抛向了历史。就在乌克兰大选几周后，苏联正式解体了。然而，将苏联政治公开性改革和乌克兰及其他加盟共和国民族运动的兴起，仅仅归因于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不正确的，但此次事故对上述相关事件的影响怎么描述都不算言过其实。

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归罪于运转失灵的苏联体制和此类核反应堆的设计缺陷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这样一来，便也暗示这些问题皆归于过往了。不过，这样的信心怕是用错了地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堆芯熔毁事故的原因时至今日依然显而易见。权威的当政者希望增强国家实力，巩固本国地位，希望经济加速发展，克服能源与人口危机，但对于生态问题仅仅是给予口头承诺。比起1986年的情形，如今这些情况变得更加明显。假如我们不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汲取经验的话，切尔诺贝利式的灾难很可能会再现。

闲读随笔

## 撒文字而成文章

□刘诚龙

刘君的写作状态，对应着她的写作观。她在《好散文的标准》里说：“当下有些散文，一味追求信息的大容量，密不透风的叙述挤掉了散文的轻松，叙事过多类似小说，论辩过密类似杂文，逻辑严密类似政论，写人求全类似传记，结构和叙述都把握得太紧，结果必然造成对散文的伤害。”读到这里，深以为然。现代散文有病，天知否？刘君知之，散文已经失去了灵动，散文已经失去了率性，散文已经失去了诗意的自在跳跃与文姿的曼妙腾挪。

刘君的新书《为文有时》，是一本编辑手记。编辑手记，推想来是研究文章作法的。确实，刘君的这本手记，多是指导与点评文章的；对，我们看到《为文有时》有宏观的文学概论，更有微观的文章点评。但，你别把这本书当理论集。这是理论？不，是散文；这是散文？不，随笔；这是随笔？不，这是文章的眉批。亦理论亦散文，亦随笔亦眉批。四不像？四全像。理论见其识，散文见其笔，随笔见其性，眉批见其心。



《为文有时》  
刘君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随笔形在随，随笔神在意。刘君的随笔相当“随”，这就是撒文字了。开笔是随机的，运笔是随手的，笔到处是随意的。起笔不在随，落笔必到意。读刘君《为文有时》，随处都可见其灵感跃动，随处都可见其见识高远。刘君对文学的理解，对文章的辨析，惊艳而抢眼，诸君可以读而领略。

第三只眼

## 除了“效率”我们还应追求什么

□李姗

一位85岁的老妪在进行髌骨手术一周后被告知需要立即出院，否则她将成为拖累病区绩效的一个“负面数字”。在后工业社会中，已经习惯用“效率”来权衡大部分问题的我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哪怕人被异化为一个数字。但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回溯至本世纪初，而这位老妪是与你有着血肉之亲的母亲或外婆时，情况又会如何？

2001年，加拿大政治学家、国家关系专家贾尼丝·格罗斯·斯坦在梅西讲座上做了一次“跨界”尝试，将焦点从她熟悉的国际冲突问题转移到了对后工业社会如何成型的阐释上。而切入点，正是数世纪以来公共讨论中长盛不衰的话题——效率。上文提到的那位老妪，正是斯坦年迈的母亲。

效率——本该是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在古希腊人眼中，它是政治和社会运转的方式；工业革命早期，亚当·斯密将其视为提升生产力的强劲动力；时至今日，从赤贫社区到富裕阶层，从个人到国家，效率被奉为公共生活的首要目标。后工业社会究竟有何特质，能赋



《效率崇拜》  
[加拿大]贾尼丝·格罗斯·斯坦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同样的春日飞雪，古人会云‘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如此的诗情画意，而我们会说，四季随机插播，我一定过了一个假的春天，何其简单而粗暴。”搞文学理论的，会有这么美的开笔吗？刘君的这篇《把整个春天给你吧》，她是在谈文学的经典性的，没想到她会这样的开头。然后谈《红楼梦》，然后谈文子中的“止学”，然后谈“中国诗词大会”，然后落笔于文学与哲学的“经典性”。通其篇，没感觉刘君在谈理论，只感觉她在谈感觉。以感觉去抵达理论，这就是散文笔法。

这就是刘君“撒文字”。很多的典故，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材料，很多的诗意图句，她好像都装在胸中，随手一抛，随意一丢，一转眼，你就看到绿油油的麦子从土里长了出来，你就看到红艳艳的花朵从天空中生了出来。随意中，可以看到她所要达到的“意”牢牢挽住了材料的“随”。看似随手一抛，实际句子与材料精准到“点”。如老农抛秧，你看到了错落，你也看到了其行间距；如球手发任意球，你防无所防，球已经进网。漫不经心，漫已进心。随意组织材料，随意运笔句子，却可以看到文脉的逻辑演进，看到文章的井然秩序。真不知道，刘君腹中藏了多少书华，真不知道，刘君脑子里藏了多少妙思。撒文字与其他诸般写作状态不同，必须有腹有诗书，必须是胸有成竹。袋子里没有充足的珍珠，如何抛撒？

有一天，我听了刘君自写自读的《她的美仿佛一切道理》，方知刘君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出身呢；“果然，一边写散文一边写诗的刘君，一次突然向我展示了她的书法，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张期鹏语）”。吃一惊不行，还得吃惊，刘君生北地女儿，却有南方灵秀；刘君或许有吃不完的惊，她的布画油画也着实让人吃惊。这本《为文有时》，里面很多插图，都是刘君自己的。读这本《为文有时》，读者会有意外之得，可以得到一张刘君画的书签呢。

予效率如此显要的地位？斯坦认为，当效率开始向内部转移，不再是达成目标的方式反而“越俎代庖”成为目标本身时，就产生了效率崇拜。这一改变进而转变了国家角色，形塑了人们对选择权及责任的看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尖锐地指出，人们无法在价值观、利益、情感和承诺之间进行甄别，理性选择模式把人塑造成为“理性的傻瓜”。而当下，作为“满意度、效用性最大化”的代名词的效率则嬗变成成为当代的理性选择概念。但效率并未帮我们理清思路，反而让我们陷入多个悖论之中。第一个悖论在于，我们在讨论效率时，希望国家放手，让市场带来更高的效率；但需要寻找监督者、问责人时，我们转而又向国家寻求帮助。第二个悖论在于，效率和市场促成了一种不断壮大的关于选择的话语。我们远离国家去创建公共市场，回过头来又宣称选择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权利。第三个悖论在于，目前我们关于选择的思考方式掩盖了许多最为棘手的价值冲突。个人、市场、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张力之中。

隐藏于“效率”的面具之下，斯坦真正想复兴的，其实是一种公民讨论的传统，其中心问题是探讨后工业时代里我们应该如何履行公民责任。在她发表演讲前夕，刚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国家安全问题前，人们放下了对效率的要求，回到了讨论的起点。她认为，现在我们已经越过效率崇拜，把效力意识转化为对责任的坚持、对我们能力的肯定，以及对选择的要求。但这个转化过程并不轻松，我们必须先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再去探寻权利、安全、可能性和承诺的再平衡。